

中印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状、困境与展望

蒋盼

四川行政学院，四川成都，610071；

摘要：全球化逆流与地区格局调整背景下，中印作为亚洲两大新兴经济体，其合作对周边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两国在经贸互赖、政治机制建设、人文交流及多边合作理念上已形成坚实基础，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具备现实可行性。但当前仍面临战略互信不足、合作机制有效性欠缺、规则碎片化及认知偏差等困境。未来需通过深化经贸互惠、完善机制建设与风险管控、促进文明对话与人文交流，破解现有障碍，推动中印关系健康发展，为周边地区共同繁荣夯实共建根基。

关键词：中印关系；周边命运共同体；经贸关系；人文交流

DOI：10.64216/3080-1486.26.01.083

引言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地区安全格局深刻调整的当下，周边地区作为国家生存发展的战略依托，其稳定与繁荣直接关系到大国崛起的进程。中国与印度作为亚洲大陆上的两大新兴经济体，既是山水相连的邻国，也是全球多极化进程中的关键力量。两国疆域覆盖亚洲南部核心地带，人口总量占全球近 40%，经济总量合计占全球 20% 以上，其合作与互动不仅决定着自身发展前景，更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强调通过利益融合、责任共担、安全共享，构建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区域合作网络。中印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并非单纯的双边合作延伸，而是基于两国共同利益与周边地区发展需求，形成的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化合作体系。^[1]这一合作既能够破解两国发展中的资源约束、市场瓶颈等问题，也能有效应对周边地区面临的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更能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亚洲方案。

当前，中印关系虽面临一些波折，但两国在周边地区的利益交汇点远多于分歧点。从经贸合作到安全协作，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到人文交流互动，两国已形成一定的合作基础。然而，由于制度差异、规则分歧、信任赤字等因素，中印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仍面临诸多阻碍。因此，系统梳理两国共建的现实基础，精准剖析制度层面的核心困境，科学提出可操作的完善路径，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更能为推动中印关系健康发展、促进周边地区共同繁荣提供实践指引。本文基于现实观

察与逻辑推演，遵循“现状—困境—路径”的分析框架，对中印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核心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1 中印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状

在全球化格局深度调整、地区合作与竞争交织演进的当下，中印作为亚洲大陆的核心力量与周边事务的关键参与者，其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进程，既承载着两国互利共赢的发展诉求，也关乎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与一体化进程。梳理双方共建的现实现状，是精准把握合作根基、客观研判发展态势的重要前提

1.1 经贸互赖关系持续深化

中印经贸关系展现出强劲的韧性与活力，已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压舱石”。从经贸数据来看，2024-2025（截至 2025 年 9 月）财年，中印双边货物贸易额约 1 277.1 亿美元，较上一财年的 1184 亿美元增长约 7.9%，中国成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这一贸易规模的结构性转变，不仅标志着双边经贸关系的新突破，更折射出中印经济在战略层面的深度嵌合与相互依存。中国对印出口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资本品和中间品，为印度制造业升级提供关键支撑；印度则凭借医药原料、农产品及矿产资源等优势，积极融入中国供应链体系。这种互补关系覆盖制造、制药等多个关键领域，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之中，中印两国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增强了全球消费品的成本优势与供应韧性。^[2]

1.2 政治互动与机制建设有序推进

中印已建立起一系列双边对话机制，为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在边界问题上，中印边界问

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持续发挥作用，第 24 次会晤达成的 10 点共识包括设立划界专家小组、在边境东段和中段设立将军级会谈机制以及重开三处传统边境贸易市场等。在经贸与人文领域，中印外长会谈达成的 10 项成果包括恢复直航、提供签证便利等措施。这些机制的建设形成了从高层战略引领到工作层面落实的多层级交往格局。

1.3 人文交流与社会纽带逐步加固

人文交流是巩固两国关系的社会根基，中印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系列积极进展。我国开通冈仁波齐—玛旁雍错朝圣路线，切实满足了印方的宗教需求，彰显出我国尊重文化多样性、坚持开放包容的大国风范，进一步增进了两国人民的情感共鸣与相互理解。2025 年第一季度中国核发印赴华签证 7 万件，同比增长 15%，反映出两国人员往来正在快速恢复。随着印度恢复向我国公民发放旅游签证，以及两国直航航班的逐步恢复，将为深化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提供更有利条件。

1.4 趋同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多边合作框架

在全球治理层面，中印两国持有相似或趋同的理念，这为共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基础。^[3]一方面，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受害者，中印都坚决反对单边霸权、坚持多边主义，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在这种背景下，印度的“世界一家”理念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不谋而合，体现了两国对全球治理的共同愿景。

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印都是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中坚力量。中国的全球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和印度的“全球发展契约”，为全球南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全球性议题上，中印享有共同利益，有着广泛合作空间。在多边机制层面，中印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框架下，已形成基础合作机制。这些多边平台为中印协调立场、深化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2 中印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困境

尽管中印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具备多方面的现实基础，但两国在战略互信、机制化建设、认知层面仍面临严峻挑战。这些制度困境若不加以有效化解，将长期制约中印关系的深化发展。

2.1 战略互信不足与安全困境

战略互信不足是中印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核心困境，其突出表现为边界争议、安全战略分歧和第三方因素干扰等问题。^[4]在边界问题上，虽然 2025 年 8 月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 24 次会晤就边境管控达成十点共识，包括设立划界专家小组、在边境东段和中段增设将军级会谈机制等，但边界争议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依然存在。1962 年的中印边界冲突及伴随而来的中印关系长达十余年的低潮，至今仍然是中印两国增强战略互信的最大障碍。

2.2 机制有效性不足与规则碎片化

现有合作机制在有效性与约束力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虽然中印已建立包括特别代表会晤、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外交军事渠道对话等多层次沟通机制，但这些机制大多侧重于危机管控而非问题解决。在更广泛的区域合作层面，亚太地区存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等多个重叠机制，造成规则碎片化困境，使得中印在区域合作中面临规则选择与制度竞争的挑战。

2.3 认知偏差与民意基础脆弱

中印两国在国际规范理解与区域治理理念上存在差异。印度对中国的行为和意图存在高估自身影响力、认知失调、过度关注三种错误知觉。这些认知偏差的产生，既有历史包袱等微观因素，也有非对称的权力结构等级等中观因素。在区域合作理念上，印度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持保留态度，而中国对印度强调的“东盟中心地位”等区域原则理解有限。这种规范认同差异削弱了双方在区域事务中的协作潜力。

3 中印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展望

针对中印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制度困境，本文提出以下完善路径，旨在通过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逐步克服现有障碍，推动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3.1 深化经贸互惠，构建利益共同体

首先，经贸合作是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和核心动力。为进一步释放两国经贸合作潜力，首先应着力优化贸易结构，扩大投资领域。中印两国应充分利

用经济高度互补的优势，在巩固传统贸易领域的同时，大力拓展新兴领域合作。中国在电子制造、新兴产业等领域发展较快，而印度在信息软件、生物制药等方面具有优势，双方可重点加强在这些领域的贸易与投资合作，提升贸易价值链地位。^[5]

具体而言，中印可共同制定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明确重点合作领域与项目。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基建企业技术成熟、设备性价比高，可积极参与印度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印度实现“工业化”战略。在服务业领域，印度软件信息产业发达，可与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相结合，开拓服务贸易新空间。在高科技领域，双方可共建联合实验室或研发中心，共享技术创新成果。

其次，应着力改善贸易不平衡问题，促进双边经贸关系健康可持续发展。针对中印贸易中中国长期居于顺差地位的情况，中方可主动采取扩大自印进口措施，包括降低印度商品市场准入门槛、举办印度商品专展、推动电商平台设立印度商品专区等。同时，双方可加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协调，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优化升级，使印度更顺利地融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最后，应积极恢复和拓展边境贸易，发挥边境地区在两国经贸合作中的桥梁作用。根据 2025 年 8 月中印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重开仁青岗—昌古、普兰—贡吉、久巴—南加三处传统边境贸易市场。在此基础上，两国可进一步探讨建立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旅游合作区等新型合作模式，将边境地区从争议前沿转变为合作枢纽，实现边境地区的共同繁荣。

3.2 完善机制建设，加强风险管控

健全的机制安排是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的制度保障。针对当前中印机制化建设存在的不足，应从事前协调、事中执行、事后评估三个环节入手，全面提升机制效能。

首先，应完善现有对话机制，增强其针对性和有效性。中印已建立了涵盖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的数十种对话机制，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话局面。下一步，双方应重点优化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战略经济对话、金融对话等核心机制的功能定位与运作方式，避免重复对话和资源浪费。特别要发挥好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的引领作用，按照 2005 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本着相互尊重、相互谅解

精神，探讨公平合理和双方均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

其次，应构建多层次信任措施机制，有效管控分歧，防止冲突。在安全领域，可建立和完善不同层级的信任措施机制：在战略层面，继续完善两国领导人定期互访机制和热线联系；在军事层面，健全国防部长会晤机制和军事演习通报机制；在操作层面，完善边境地区军事行动通报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近期，中印双方除在边境西段保留既有的将军级会谈外，还在边境东段和中段设立将军级会谈机制，这是构建信任措施的重要进展，应确保这些机制有效运转。

最后，应强化危机管控能力，防止个别争端影响两国关系大局。中印双方应按照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秉持“双轨并进、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思路看待和处理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即一方面通过对话沟通增进互信，扩大交流合作，另一方面通过边境管控、划界谈判等措施，妥善解决具体问题。在危机预防方面，可建立中印关系早期预警机制，定期评估两国关系发展态势，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在危机应对方面，可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流程，确保沟通渠道畅通，防止误判和事态升级。^[6]

3.3 促进文明对话，夯实民意基础

民心相通是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的社会根基。^[7]针对两国存在的认知偏差和民意基础脆弱问题，应多渠道、多形式地促进中印文明对话与人文交流。

首先，应完善人文交流机制，打造品牌项目。中印两国可总结“中印友好年”和“中印旅游友好年”的成功经验，定期举办“中印文明对话论坛”、“中印大学校长论坛”、“中印青年交流年”等机制化交流项目。特别是在青年交流领域，自 2006 年起实施的中印青年百人团互访项目取得了良好效果，可进一步扩大规模、丰富内容，吸引两国更多青年参与。同时，双方可考虑设立中印友好交流基金，为人文交流项目提供稳定资金支持。

其次，应拓展新兴交流渠道，创新对话形式。在传统交流方式基础上，充分挖掘数字平台潜力，鼓励两国新媒体、网红、意见领袖参与人文交流。目前，印度博主创作的“中国游”主题视频在社交平台上爆火，留学印度也频繁登上中国社交平台热搜，反映了新兴交流渠道的巨大潜力。两国可合作开发中印文化交流手机应用，

打造虚拟文化交流平台；鼓励两国高校开设在线对方文化课程，扩大交流覆盖面；支持合拍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等文化产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促进相互了解。

最后，应推动旅游往来便利化，扩大人员直接交流。中印两国旅游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8]近期，印度7月恢复向中国公民发放旅游签证，双方正在推进恢复直航，这些举措将为旅游往来创造有利条件。下一步，双方可进一步简化签证手续，探索试行团体免签政策；共同开发特色旅游线路，如佛教文化之旅、丝绸之路之旅等；加强旅游服务协调，提高旅游服务质量，让旅游成为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的直接窗口。

参考文献

- [1] 李宇婧,王战. 中印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状、挑战与路径[J]. 南亚研究季刊,2025,(01):34-53.
- [2] 关培凤,杨鑫钰. 印度对华经贸政策安全化及其影响[J]. 现代国际关系,2025,(09):92-110.
- [3] 楼春豪. 印度莫迪政府对外战略布局及其前景[J].

当代世界,2025,(08):60-67.

[4] 张静,宋德星. 印度周边外交现实主义传统及其当代表现[J].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5,(04):26-48.

[5] 李源,王赞信. 印度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的中国产业发展策略研究[J]. 产业经济评论,2025,(04):5-18.

[6] 王晓文,国艺莹. 印度莫迪政府大国战略的新定位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J]. 国际论坛,2025,27(03):58-78.

[7] Malone D M, Mukherjee R. India and China: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J]. Survival,2010, 52(1):137-158.

[8] Devadason E S. Enhancing China—India Trade Cooperation: Complementary Interactions?[J]. China Review, 2012:59-83.

作者简介：蒋盼（1994—），男，汉族，陕西石泉，讲师，法学博士，四川行政学院，研究方向为法学。单位：四川省成都市，单位邮编：610071。